

評《風險社會》 *A Book Review of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周桂田 *

Chou, Kuei-Tien

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Director, Risk Societ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徐健銘

Hsu, Chien-Ming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壹、前言

當我們意識到的時候，我們已經坐在文明的火山口旁。

本書的德文版出版時間是 1986 年。1986 年該年發生在前蘇聯的車諾比核災和在美國的挑戰者號事故。Ulrich Beck 教授透過他對德國社會和全球風險的觀察，進而作出《風險社會》本書中的種種判斷，被同一年所發生的巨型意外所呼應。使得在 1992 年出版本書的英文版序言中，Brian Wynne 和 Scott Lash 兩位教授讚嘆本書是二戰後少數、非教科書類型（從行文風格上比較像散文）、卻引發人們廣為注意少數社會科學書籍之一。如今，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已超過 20 年，卻仍然對研究者有許多啟發；就像 Beck 採取如 19 世紀思想家的位置來分析當代問題並超越既存的基礎來思索未來如何可能，今日的研究者仍可藉其著作來擴大當下的思維並轉向未來的探索。

* Email: ktchou@ntu.edu.tw

從本書中可以得見，Beck 的目標是在追蹤被冠之為「後」（post，或者可代之為 late 或 trans）的事物。這裡的「後」，指涉我們正在踏入而逐漸成型、或甚至仍被當前情況所遮蔽的未來，以及一種我們正在經歷或者目睹、正在過去產生斷裂的現代性情況。Beck 提醒我們，本書在開拓讀者視野的同時，某些內容是站在經驗導向、反映主觀的理論（empirically oriented, projective theory），而缺乏任何研究方法上的防衛措施。無論如何，在本書中陸續可以讀到的經驗事實（主以德國為例）和預測將會發展出的過程，乃是從工業社會重塑成風險社會的過渡情況。

風險社會這本書核心著重在關於工業社會的「反身性現代化」（Beck, 1992: 12）。Beck 雖然探討「後」的情況，但是他其實是藉由風險研究和其論述來改革現代主義者的計畫。他所探討的反身性現代化可以說是一種對啟蒙計畫的重構與修補。反身性現代化意謂著對現代化過程的再一次現代化。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當前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危機，而非加深當前對制度的不信任與衝突。對於 Beck 而言，正如「現代化消融 19 世紀的封建社會結構並產生工業社會，今日的現代化正在瓦解工業社會、而另一個現代性則正在成形中」（Beck, 1992: 10）。不同之處在於 19 世紀的現代化力圖主宰作為他者的自然，當前的現代化則是自挖牆角；19 世紀被除魅的是階級與宗教，今日則同樣發生在科學、技術和典型工業社會中的生活方式。這並非現代性的終結，而是超越工業社會設計的現代性之始。前者是典型的（classical）現代化，後者則是反身性的（reflexive）現代化（Beck, 1992: 10）。

貳、主要內容回顧

在本書中，Beck 的研究核心是有關「工業社會反身性現代化的主導理念」。全書共分成 3 部分、8 個章節。前兩部分處理的是反身性現代化產物。第一部分處理的有關風險分配邏輯的論述，並描繪風險社會是什麼樣的事物，試圖重新探究如何定位當代人類的位置。透過對財富分配的邏輯和馬克思與韋伯的理論對話，形塑出風險的邏輯、以及因風險而聚集、因認知和文化各自占有立場的人群。

第二部分則是基於個人主義化的論述。由於現代化過程一方面使得社會得以宰制自然，另一方面也使得對自然的破壞變成社會內部的問題，而不再只是外在環境的問題。這使得原來在工業社會中主要財富分配為首、風險分配受其宰制的邏輯，轉成兩者同時競爭並且互不相容的新情況。再者，個人主義化也是反身性

現代化的產物。就如同傳統社會的現代化瓦解 19 世紀的勞動與生活型態，工業社會的「傳統」——福利國家與勞動市場的一般化、教育和就業關係、家庭與兩性分工——也被再進一步的現代化所瓦解。第三部分則基於前兩部分，主要處理在反身性現代化和個人主義化的情況下，以及如何對作為工業社會基石的科學典範及其視野，以及重塑政治系統及其決策過程。

在本書有幾個關鍵重點，首先是風險分配的邏輯。Beck 從毒物在環境中的流布開始探討風險。風險分配跟追求「平均值」解答之間，出現置現實情況於不顧的忽視。這種忽略了年齡、性別、飲食習慣、工作方式、資訊、教育不同，以及單一產品雖然看似在安全範圍內而無害，卻對生物累積的人體健康可能造成影響。在此，自然環境的毒物分布成為人們現實的社會危險處境。

而風險處境所需的知識又因其不可見性，而必須再進一步仰賴科學。因這些危險處境越來越難以感知來接收，又或者可能發生在下一代身上。然而，現代化風險會同時呈現特定地域性及非特定普遍性，而科學的預設並無法掌握不確定和暫時的災害路徑。在這種情況下，科學一邊調查風險的內涵，其過程是建立在假設上，而以機率作為可能性的框架行動。當科學條件被設置在極苛刻的情況下，其對安全的假定使得事實上的意外反而像是真正的意外。因其根本不在計算的公式之內。因此科學理性沒有社會理性是空的，社會理性沒有科學理性是瞎的 (Beck, 1992: 30)。

風險的因果關聯性本身就是諸多個別條件彼此互相糾纏之間的複雜集合。試圖找出個別原因和責任，反而可能形成普遍不負責任的共犯結構。風險是現今不存在、但導致今日行動的原因。風險社會因此是一個面向未來的社會。而風險因其作為潛在副作用，而獲得影響我們當下的決策之合法性。但進一步質問，到底是越來越多的風險，還是越來越尖銳的風險感受？

Beck 認為政府的行動在污染排放的設置上，只是為風險進行粉飾而非預防。所以，自風險誕生的是科學工業和政治，透過破壞既有的政治和科學之信任得利。這裡更誕生了理性間的競爭。自然科學雖然輕視大眾的恐慌，但仍在長期的過程中，失去一部分的權力到民主的過程中。他認為人們也應該認識到經濟風險的盲目性，以及邊際值的欺騙效果。

第二個重點是 Beck 過去對制度的研究和它與風險社會觀點之相結合，他認為應該要有新的理論與範疇來支持我們的當代研究。兩者連結之處在於被重新拋擲到制度化市場中的個人主義化過程。Beck 在論證這點時，再度與 19 世紀的觀察者馬克思和韋伯對話。他認為戰後德國所發展的社會結構已經不再能以階級和

階層視之。他進一步指出風險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風險處境也不應當被理解為階級處境，風險衝突也不能被視為階級衝突；現代化風險 (Beck, 1992: 36)，因為風險並不分階級降臨。

在馬克思的觀察中，是貧困化和勞動異化的共同經驗消除個人主義，才能促成階級形成。但在 Beck 的看法裡，今天的個人不再被融合到階級團體之中，而是在福利國家的工資勞動中個人化。他也指出以韋伯的社會階層概念——以市場為中介，使得地位轉為階級的框架來看德國，自 1950 年代以降已隨著教育擴張、大量失業等情況而不能適用 (Beck, 1992: 96-97)。

傳統的階級與階層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一個已經日趨自我選擇而個人主義化、但又不自主的社會；兩性分工正在重新磨合，並且與新家庭型態和職場生活一同進行。個人在此被福利國家的制度所標準化與納入治理的單位中，但個人的命運卻被重新拋擲到市場競爭中。傳統上的教育文憑和職業取得之間的聯繫變得淡薄，為此也使得工業社會中的職業與家庭生活間的穩定性變得搖搖欲墜。教育和就業間的市場關係之斷鏈，形成某種程度的個人境遇之再封建化。在這個過程中，風險與決策變成每個人的個體經驗，而不再是以階級和階層的形式出現。

由於生活型態的改變，個人主義化、大量失業與新貧窮等「當時的」新現象（如今已經變成我們正試圖習慣，但又試著要掙脫的枷鎖），促使傳統理論必須要轉向新的理論，因為現實環境已來到一個新的水準。但 Beck 並沒有為我們提出最終的解答，而是指出未來的衝突將會越發多元；衝突將能打破既有結構化的意識型態與聯盟形式，並依情境和參與者的訴求主題而有別。

事實上，風險社會一書提供的是一套座標系統，一套對當代工業社會進行反思的定位方式。透過在德國經驗的數據，以及當時流行的論述和過去的社會狀態進行比對，發現了人類在實際生活與感知上的位移。這種位移對貝克教授而言，就是從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轉向風險社會，也是從財富分配的邏輯轉向風險分配的邏輯。同時也是從維繫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小家庭、兩性分工和職業生活位移到個人主義化的新生活型態。最終，在反身性現代化的標題下，如何超越啟蒙科學的信念，並拓展既有科學典範的視野。另一方面，則是對治理的政治過程提出批判，並指出政治的去邊界化現象，以及質問科技與政治的兩難。

Beck 挑戰科學實證邏輯的計算，質疑其是否能確切地表達出當代社會中的境況。這種質疑廣布在全書對於統計平均值、管制標準的建立和邊際值的探討中。這實際上說明當代科學理性壟斷對於事實的說明、也就是論述的權力，這是必須要再被再一次透過民主的過程為之解放。正如 Wynne 和 Lash 在引言中提到，

實驗室知識所打造的風險系統理想模型，與實際的應用環境、設備和知識之間的巨大落差。而需要透過反身的學習過程（reflexive learning process）來與各種知識、次文化和認同進行協商磨合。但這個解放過程所需的卻毫無疑問是更多的科學必須要進入，並且迫使科學反身性不斷地累積，最終達成一種不斷學習的狀態，而非全盤推翻科學。Beck 認識到社會變遷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參、反身性現代化與東亞社會

關於社會變遷過程，Giddens 同樣地在大約的時間點上捕捉到這一鉅變。Giddens 在大約同期的作品如《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1990）和《現代性和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1991）等書中，展現出對反身性的另一種剖析，對於個體自我創造和生命敘事，以及對符號標誌和專家系統的信賴承諾與風險。在 Giddens 的眼中，人們進入到高度的或者晚期的現代性之中，而非進入後現代之中。對 Beck 和 Giddens 而言，社會都經過前工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簡單現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以及工業社會再現現代化—反身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此二過程（Beck, 1994; Giddens 1994）。

而 Giddens 進一步闡述現代性特徵的時空分離（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必須仰賴抽象系統（abstract system）加以穩固。人們透過信賴符號標誌（symbolic tokens）和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這兩套抽象系統來重組和調度時空，而這兩套系統需要信任（trust）才能得以運作（Giddens, 1990: 351-417）。換言之，人們必須對現代生活中的抽象系統加以信任——即使他們並不完全瞭解系統的運作——才能夠繼續藉助這套系統來簡化其生活。

但相對於 Giddens 樂觀地透過知識來反省，以改善專家系統所提供的知識技能，以 Beck 的觀點，此處的反省是一種反作用力、副作用。風險的具體性在於難以控制、無法計算、無法賠償、沒有極限，這些無法純粹以知識加以預測和控制的後果成為現代社會／社會變遷的推動力，是一個現代性與其自身自我對質的局面；定義以及處理這些風險成為風險社會的核心議題。換言之，由現代性的發展轉向反身性的過程，Giddens 的概念是對系統現況的反思、讓它更加完善（better）；而 Beck 則是透過現代性的副作用來面對現代性，要從其體系的根部重新挖掘、檢視。

Lash 則認為 Beck 和 Giddens 的行動者過於自我（ego）且偏重於認知層面，

其反身性對應於個別社會對現代性的願景 (Lash, 1994; Lash & Urry, 1994)。Lash 認為 Beck 和 Giddens 所討論的反身性是在認知上的反身性、以對風險的認知來衡量，美學的反身性則是以不安全感 (insecurity) 為衡量。另一方面，Wynne 和 Dressel 同樣認為 Beck 過度偏重認知面；在分析英國和歐盟處理 BSE 爭議時，進一步認為 Beck 將「無知」(non-knowledge)¹ 概念化深具啟發性，但是其分類：「知識的選擇性觀點和仲裁」、「知識不確定性」、「犯錯與錯誤的可能性」、「無能力知道」與「無意願知道」等 5 種模式卻不能夠完全解釋國際或國內的風險治理 (Wynne & Dressel, 2001: 127-129)。

Wynne 和 Dressel 進一步認為 Beck 的認知面分析無法明確區分：明確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作為論理的 (工具性的) 工具以及社會行動者 (也可能缺乏知識) 審慎反思中所可呈現之對象；具體知識 (embodied knowledge)，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實踐的一部分、往往是整個社會運作的一部分，但沒有或是無法被其行動主體所反思或明確表達。

由於社會與文化的偶然性 (contingency) 可能導致不同的知識與知識構造 (framings)；因此，Wynne 和 Dressel 為了捕捉無知的概念，便使用虛擬知識 (virtual knowledge) 來稱之；這是一種既定社會團體的實際承諾和習慣所建立起的、暗含在的知識或信念。舉例而言，如果飼牛業者添加動物遺骸到飼料之中，他們便暗含著以下正面的信念：若非認為動物飼料不會造成感染，便是即使會造成感染，也不會再感染到其它物種如食用的消費者。Wynne 和 Dressel 進一步將無知經過文化概念化為「邊界知識」(borderline knowledge)，無知 (ignorance) 則是知識的具體元素 (Wynne & Dressel, 2001: 129)，他們認為創建知識條件的過程也正是創造人類自我、道德承諾和文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無可避免地是選擇性且有限制的認知過程；在此一文化過程中，為使任何的知識一致性與結構性有所發展而內生的保證，導致同時也產生出無知、知識排除與「缺乏意義」(lack of meaning)；換言之，知識和無知共同受到其國家和／或文化脈絡的形塑 (同上引)。

面對這些探討，Beck 在本書中處理人類科學與知識不確定性時，認為風險無疑是一種現代的科技產物，而且必須透過科學的知識來理解。但他也在其指出

1 風險社會的核心中軸是知識與知，無知的概念引自 Beck (1996) 在討論人類的「不知道」(nicht-wissen) 之動態狀態，英文除了 non-knowledge 以外，也同時有 ignorance 之翻譯；由於其關鍵在於「為何無知」的動態狀態，因此才有「知識的選擇性觀點和仲裁」、「知識不確定性」、「犯錯與錯誤的可能性」、「無能力知道」與「無意願知道」等不同模式。

這意謂著意識（知識）如今決定存在，是知識為社會帶來超載的災難，但也是知識在為社會系統鑲上那關鍵的保險絲。在其後的《世界風險社會》一書中，他也承認風險還是關於習慣與文化；是文化的認識與定義形成了風險 (Beck, 1999)。

不僅如此，不同文化和社會所面臨的風險問題及感知重心也因此將有所不同。Beck 從德國和全球的社會現實中抽象化而得的風險社會概念，適合諸多研究者作為觀察的啟發和起點，但仍尚待深化。2010 年的英國社會學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的風險社會專刊，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作者也從經驗上顯示不同社會的觀注重點與發展情況的不同，使得風險社會的概念始終是保持多元而非單一樣態的。

如南韓學者進一步認為第二現代和反身性現代化，如同全球趨勢，影響東亞極深如同西方一般。Chang (2010) 使用「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 來形容追趕型社會所面臨的急遽擠壓所帶來的後果；因為追趕式發展而以無預期的後果形式產生、威脅生命的風險與危險，大眾挫折且醒悟的認識在東亞非常高。周桂田認為這種短時間內的現代化發展缺乏自主建立的基礎，「產生了擠壓、快速模仿西方社會的變異結果」，使在地社會發展出特殊的「現代」經驗；可能在某些面向有較強的規範力道，有些面向又純粹是形式制度而無實質內涵 (周桂田, 2003)。

這是因為後進國家因為後殖民社會的歷史結構性因素，使其持續在制度和意識型態上受西方支配，從而導致不斷追趕和模仿西方工業社會模型。在以西方視野和範疇來看待在地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反使在地制度的建構始終不夠健全，也難以警覺其社會自主和傳統文化的消逝。這是因為在地社會缺乏引入之制度、科技和思想進行反思與批判基礎的哲學，也因為歷史發展的原因而未能有成熟的公民監督與批判力量。然而，這些深層的原因同樣被主流的西方論述所遮掩，從而掩蓋「多元地區風險發展的事實與問題」(周桂田, 2003)。

肆、與社會學對話

另一方面，本書的一個問題在於為了主觀突顯風險社會的邏輯以及當前的各種高不確定性問題對人類的衝擊性，以致於給予讀者一種對傳統社會學問題不那麼重要的傾向。雖然 Beck 的質疑是有意義的：為什麼在傳統社會裡面，分析的範疇是職業、性別、階級、收入……等；到了工業社會，分析的範疇仍是這些；再到未來的社會，分析的範疇仍然沒有變過。Beck 對於社會研究工具和分類標

準的批判是有力，社會學的反思也有價值，但仍須進一步將其散文般的論述再聚焦。

比方說風險分配。Beck 認為現代化系統性的副作用導致「風險的社會生產」伴隨著「財富的社會生產」而來 (Beck, 1992)。同一性的、在災難中被製造出來的風險劇烈性，排除風險分為不同層級的可能性，並且使 Beck 可以總結到「私人逃生通道」將被關閉，將我們全部描寫為藉由「反身性現代化」(Beck, 1992) 而臣服在災難形式的風險之下。

階級處境與風險處境之間的關係可以透過 Beck 對於「擁有與沒有」和「不受波及與受波及」之關係來修正其判斷；世界中仍然存有特定的一群人、一些國家因為「擁有」較多保護自己的能力而較「不受波及」；同時也有一群人、一些國家因為「沒有」保護機制而「受波及」。風險雖然是不分階級地分配於所有人，但是其造成的危害卻是有差別的。

非常重要，這種社會建構的惡的分配將不僅受階級因素影響，也受其它社會結構而成的弱勢因素，如性別和種族影響 (Adger, 2006; Cutter, Boruff, & Shirley, 2003)。鑑於在許多案例中，弱勢者如非裔美人，占據較高比例且脆弱的位置，也由於他們較低的社會經濟狀態，這些不同的惡的分配之分層化邏輯，可能對這些脆弱的人群進一步放大種族與階級的效果。

來自對食物、水、土地或者是空氣危害最初的風險分配可能恰是 Beck 平等主義分配模型，因為其極端的不確定性和危害本質的不可預測性。然而，正如前所述，某些並非因階級而建構的風險存有，不會因此降低風險的階級命題之適切性，相反的，還可能因此強化了它的適切性 (Curran, 2013b)。

這是因為，雖然最初的風險分配可能是平等的；但當個體們逐漸認知到這些不同的風險之效應以及其相對的分布，那麼能逃離毒害和風險源頭的能力，將會因為那些可以輕易取得未受污染的食物來源或土地之寡占者，以及那些能在這些「私人逃生通道」上開高價的人，還有只能勉強度日的人之間就也會有巨大的區別，不管這些風險是以何種形式具體出現 (Curran, 2013a)。

事實上，非特定普遍性的、彌漫在我們生活中的那種風險特質，只有在特定地域內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等脈絡進行連結與探討，才能展現真實世界當前與未來對於風險議題的把握。因此，傳統的社會學問題如階級、財富與知識都將以雙重的風險——非特定普遍性與特定地域性的——作為思辨的共同主軸；階級社會對於資源的分配、財富分配的邏輯與風險抵抗的能力，以及掌握無形風險的知識等問題在風險的雙重性格上展現了個別在地社會的風險能耐。而 Beck 所論之國

際不平等因此也可以如此思考：是個別社會的在地脈絡及其能耐，促成在非特定普遍性的風險中之不平等，風險的分配與財富、科技和知識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後三者的綜合（synthesis）卻緊密地影響對抗風險的能耐，以及同樣的風險在個別社會中作用的力道。

無論如何，《風險社會》一書如同一本預言書，Beck 預見到今天人們仍然將具不確定性的事物、也就是社會變遷、歸於政治系統治理的工作；即使其實社會變遷與政治系統的關係脫勾，而更多是個別的科學、經濟和社會決策所產生的。

他同時也預見到在風險社會之中，將有越來越多的浮動選民，使得傳統政黨的鐵票或票倉難以為繼。更多情況是政黨必須要一直推出吸引民眾的特點。這也和政治權利的長期深化所導致的政府權力之折損有著同樣的趨勢，並且彼此影響。還有民主的君主政體這一矛盾情形。

藉由此書以及這近 30 年來的風險社會學發展，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專家、知識體系統和價值加入這場風險論述的大戰之中，導致身處其中略感混亂。而本書所指出的許多發展方向和未成形之物，有些已經顯現出來、有些則否。但誠如 Beck 所言，當一個社會愈少公開的認知到風險，則將產生愈多的風險 (Beck, 1999: 144)。藉由本書，研究者仍然能夠自 Beck 最核心的觀點和捕捉未來發展輪廓的方式裡受益。

伍、參考書目

- 周桂田 (2003)。〈從「全球化風險」到「全球在地化風險」之研究進路：對貝克理論的批判思考〉，《臺灣社會學刊》，31：153-188。
- Adger, W. N. (2006). *Vulnerabil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6, 268-281.
- Beck, U. (1999).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MA: Polity.
- (1996).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the global social order*.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1994).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U. Beck, A. Giddens, & S. Lash (Eds.),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p. 1-55). Cambridge, MA: Polity.
-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Chang, K. S. (2010). The second modern condition? Compressed modernity as internalized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444-464.

- Curran, D. (2013a). Risk socie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ads: Theorizing class in the risk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4, 44-62.
- (2013b). What is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risk society? A reply to Beck.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4, 76-80.
- Cutter, S. L., Boruff, B. J., & Shirley, W. L. (2003).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4, 242-261.
- Giddens, A. (1994).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 Beck, A. Giddens, & S. Lash (Eds.),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p. 56-77). Cambridge, MA: Polity.
-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sh, S. (1994).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 Beck, A. Giddens, & S. Lash (Eds.),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p. 110-173). Cambridge, MA: Polity.
- Lash, S., &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UK: Sage.
- Wynne, B., & Dressel, K. (2001). Culture of uncertainty -- Transboundary risks and BSE in Europe. In J. Linnerooth-Bayer, R. E. Löfstedt, & Sjöstedt (Eds.), *Transboundary risk management* (pp. 121-154). London, UK: Earthscan.